

70 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整体演变、 战略意图和影响因素*

贺 平

内容提要 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游离型”“回归型”“融入型”和“引领型”四个阶段。经济外交中,“经济”与“外交”日益实现双向互动,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双重特性。影响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变化;世界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中国对于国际格局及世界经济的战略立场;中国对于经济与外交关系的整体认知和态度。由此促使 70 年来的中国经济外交在行为主体、手段方式、机制建设、风格取向和内外联动上表现出一系列的整体演变特征。

关键词 经济外交 战略意图 影响因素演变特征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已从一个规模庞大但积贫积弱的国家变身为全球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2002 年以后,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三成。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第三大利用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举一动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运行和调整产生着重要影响。当前“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趋势加剧,部分国家在经济外交上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有增无减,在此背景下,对于 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梳理尤为必要。

经济外交涉及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诸多领域,但不完全等同于对外经济政策本身。本文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探究经济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行动逻辑,将经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演化的大背景和整体语境下,明晰经济与外交之间的辩证关系。鉴于 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各个阶段同中有异、各有侧重,相关分析将择其重点和特征,不求面面俱到或平均分配。

一、中国与世界互动视角下的经济外交辨析

对于“经济外交”的分析,首要的问题在于辨析经济与外交的关系:何者为工具,何者为目标。所谓“经济外交”,既可以指利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收益,即外交为经济保驾护航,也可以是借用经济杠杆追求政治目的,即经济服从和服务于外交。传统的研究多强调前者,或将其限制为“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职能部门围绕经济事务,针对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而对外开展的官方交往活动”(李巍, 2018)。有的研究强调经济外交是指国家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经济摩擦与纠纷(赵可金, 2011),还有的

* 本文为杨洁勉教授主持的课题《中国外交 70 年》的子课题成果。

研究把经济外交聚焦于对外经济政策或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决策和谈判”特别是围绕核心经济议题开展的谈判(伍尔考克,2015)。这些研究往往把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出口或投资等行为界定为“商务外交”与“经济外交”加以区别。

近年来经济与外交的互动日益紧密,在现实中很难对其作黑白分明的区隔,两者彼此促进的态势日趋明显。因此,经济外交越来越呈现出一体两面的结构特征(贝里奇和詹姆斯,2008)。一方面是处理经济政策问题的外交,其中也包括“商务外交”,如传统的伴随领导人出访的政府采购大单、“能源外交”以及近年来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出现的“核电外交”“高铁外交”和“港口外交”等。另一方面则是使用经济资源进行的外交工作,如援助和制裁等,即所谓的“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Baldwin,1985)。“经济治国术”旨在运用经济工具影响他国的政策行为,既包括正面手段也包括负面手段。前者以商业妥协、技术转让等“经济诱导”为代表,后者则以经济制裁与限制为特征,两者相加,即传统的所谓“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统一(Blanchard等,2000)。换言之,经济外交中的“经济”与“外交”都兼具工具与目的的双重特性,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是经济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晓通,2013;2014)。

在美国等大国的实践中,“利用全球经济力量促进本国外交政策”与“使用外交政策工具以支撑本国经济实力”是经济外交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中国的经济外交同样也是其“大战略”的一部分,在70年的发展中日益表现出这一两面性。对中国而言,经济外交隶属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近年来,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各个层次谋求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的事例也显著增加,日益成为一种常态(Li和Natalie,2016)。

基于上述定义和判断,对于新中国70年经济外交的分期,不同的学者尽管表述略有差异,但大致的时间界限是基本趋同的。各个时期代表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例如,按不同领导人的代际顺序,分为“意识形态型”“接触型”“融入型”“参与型”和“领导型”五个阶段(赵文志,2016)。有学者将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外交分为“接触性”“融入性”“参与性”和“领导性”四个阶段(李巍和孙忆,2014)。也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历程分为“接触和试探、学习和融入、参与和治理”三个阶段(任晶晶和王浩,2015)。此外,针对贸易、援助、投资等具体领域也存在相应的分期,各个领域之间的整体演化趋势往往是一致的,但阶段性变化的明确节点前后略有差异。

二、新中国经济外交的阶段性发展

我们认为,70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变化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离型”经济外交和“回归型”经济外交、“融入型”经济外交、“引领型”经济外交。这也大致与中国领导人的代际传承相吻合。

1. “游离型”经济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外交在整体外交框架中的地位是相对弱化的,与国际经济体系是相对游离的,在部分时间段内甚至表现出“对抗性”和“革命性”特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力求自给自足,同时,囿于冷战格局和政治体制差异等,意识形态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十分突出,无论是对国际贸易的态度还是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等都是如此。

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与中国的外交取向高度吻合,甚至可以说完全在整体外交的框架内展开。也正因如此,经济外交随整体外交的变化呈现出若干阶段性的变化。例如在建国初期采取“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造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在冷战拉开帷幕的大背景下则力图粉碎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为此,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国家等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伙伴,优惠贷款、技术援助、易货贸易等是主要方式。同时,作为获得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的一员,中国积极谋求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联系。此后,在中苏分歧扩大乃至关系破裂的背景下,中国越来越重视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摆脱在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此时的经济外交主要是作为构建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工具。其间还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不正常状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但表现在国内的政治运动中,也同样被投射到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判断和处理上。

整体而言,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在第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谋划中并不居于显著的地位。因此,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或“争取外援,但不依赖”的原则事实上始终是一条主导性的原则。中国领导人尽管也重视“互通有无”,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外国开展商业交往,但这在外交方针和日常实务中毕竟不处于前列。

正是由于上述战略背景,与其他领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在于对外援助。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开始于1950年向越南和朝鲜提供物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援助金额逐渐提升,援助对象也更为广泛。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期间,正式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外援任务越来越繁重,对外经济联络部连续五次召开中国援外工作会议。1968~1976年援建坦赞铁路、1964~1970年援助越南抗美、1970~1975年援助印支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抗美、1954~1978年援助阿尔巴尼亚等都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外交遵循“以援助促外交”的路径。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援助对象,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20世纪50年代中期向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力图打破国际社会的对华孤立;还是20世纪60年代加大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与西方和苏联进行“援助战”,都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Copper 2016)。因此,尽管对外援助具有“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特点,但往往由于过度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导致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超越了自身能力与对方需求(周弘 2008)。

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起步之前,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形态,且由于严峻的国际战略对抗导致长期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由于受到冷战格局、东西方对立等战略背景的制约,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游离在国际市场之外。但在后期,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松动,中国也积极利用亲华贸易促进组织和游说团体的力量,为缓解乃至打破贸易禁运寻求出路(Mitcham 2005)。例如,“备忘录贸易”成为中日建交前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对于两国保持接触和双边关系的最终解冻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又如,面对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放宽对华经济管制,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到求同存异、寻求突破的明显转变。从政策效用和影响评估来看,这一政策调整对中美双方缓和敌意、增加接触、建立互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回归型”经济外交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向,“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1997年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新“三步走”发展战略。

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中国希望打破孤立状态和自我束缚,重回国际经济舞台。市场开放、技术合作等对外经济交往由此被视为“一个战略问题”,服务于全面的“现代化建设”,而非仅仅是逐利的商业行为。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甚至提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因此,这一时期尽管经历了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风波等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动,

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剧烈起伏等变化,但整体趋势仍是中国积极寻求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接受和学习其制度和规则。在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下,经济外交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为了加强对贸易和外国投资的管理,1979年中国成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1982年,由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四个单位合并成立了新的对外经济贸易部,1993年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成为2003年成立的商务部的前身。

1979年,中国正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合作基本协定》,接着又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签订协议。中国开始大量利用多边国际援助,并接受来自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Davies 2007)。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同时,中国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发展援助。1983年,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中国援非四原则。1995年,国务院召开援外工作会议,决定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要点在于:(1)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贴息贷款),以扩大援外资金来源;(2)按照国际惯例,推动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就援助项目开展合作;(3)实施以援助与投资相结合带动贸易、工程承包的“大援助战略”,以进一步拓展市场(张海冰 2013)。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事实上与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基本同步,也得益于此。例如在国际贸易方面,世界贸易结构加速调整,跨境的货物、资本、人员和技术交流更为开放,相应的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成本也大大降低。这些都为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回归”全球化主流、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也促使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积极接纳中国,欢迎中国的“回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加剧,国际形势总体平稳,有利于中国经济外交的渐进式发展。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因此,经济外交也在这一总体目标下循序渐进地展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

3. “融入型”经济外交

2001年12月11日,在经过15年漫长的“复关”和“入世”谈判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方。对中国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又一次“改革开放”。以此为界,中国经济外交的主动性和进取性不断提升。对于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回归”,而且践行积极的“融入”。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正确把握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辩证关系”,强调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期待“发挥政经结合的最大效应”。在2004年的《中国外交白皮书》中,“经济外交”开始成为官方表述,2005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我们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融入、参与和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提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存在感、话语权、影响力也不断加强,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以及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学习榜样。

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政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努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2005年,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对外交往能力的提高,“和谐世界”成为指导中国

开展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尽管中国政府仍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还面临着“风险和挑战”,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更为积极,强调其“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因此,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社会民生项目和国际应急人道主义援助成为新的亮点(周弘 2013)。其基本特征是:(1)对外援助的投入力度显著加大,对非援助增长迅速;(2)援助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科学发展;(3)援助领域不断扩展,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商务部研究院 2008)。2004年8月31日至9月1日,国务院首次召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中,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2005年5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五大举措”和“八项政策措施”标志着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开启了新的里程(周弘 2008)。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贸体制也初步建立起了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又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的新型外贸管理体制(傅自应 2008)。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简称《外贸法》),这是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第一部基本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 19 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外贸法》修订草案,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面重塑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贸易,在稳定、可预见、非歧视的多边贸易环境下,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世界各国广泛发展经贸合作,妥善解决贸易摩擦”(易小准 2011)。这“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制度红利”,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最重要里程碑,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及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条件,也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动力”(陈德铭等 2014)。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发展历程深刻表明,中国努力与多边贸易体制接轨,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取得了国内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显著受益者。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多边贸易体制中地位、作用和影响的变迁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缩影。将自身定位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这是中国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发挥“建设性作用”,意味着既要着力解决现有的矛盾和争端,合理、规范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理念和规则来发展自己、保护自己,更要着眼长远,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转机制,使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转变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制度典范(贺平 2006)。

进入 21 世纪后,在注重多边和区域的同时,中国大大加快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建设步伐。2001年加入的《曼谷协定》(《亚太贸易协定》)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国已经签署并实施了 16 个 FTA,FTA 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具有明显的跨区域特征,充分展示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立场和决心。

4. “引领型”经济外交

新中国经济外交的第四个阶段起始于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迅疾席卷全球,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国际政治影响仍在进一步发酵。

这场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水平,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注重“积极有所作为”,在坚持全面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拓展发展利益”,在坚持全面推进外交工作中“充实完善外交布局”,并重视维护海外利益。中国的经济外交日益表现出“引领型”特征。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不再只是单纯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是积极塑造乃至引领国际经济的议事日程、规则体系和价值取向,践行“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领导人陆续提出一系列理念和倡议,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坚持正确义利观,从“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都包含了重要的经济外交成分。

其间,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GDP)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国际和区域舞台上,中国期待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新发展银行、启动丝路基金、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建立和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18年中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力图彰显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

利用联合国发展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系列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舞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机制,中国积极提出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例如,在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

中国政府自身对经济外交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和实践成效也得到显著提升。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新局”,其中“经济外交取得新进展”。而从2015年开始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外交分别给予了“成果显著”“卓有成效”“成果丰硕”等更为积极的评价。商务部、外交部等相关部委也借助各种场合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基本原则等作了全面的公开阐述(高虎城,2014;张军,2017)。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亮点纷呈,主要体现在金融外交、投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第一,金融外交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增长点。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性,传统上中国对国际金融的介入相对较少,早期的金融外交主要集中于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并处理与其关系上(李巍,201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实际需求,也促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采取更为实用主义和注重“机制多元化”的路径(Ferdinand和Wang,2013)。

从合作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外交表现为由近及远的三个舞台。在双边舞台,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阿联酋等二十多个经济伙伴和关键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在区域舞台,在中国倡议和推动下,东亚外汇储备库得以建立,中国与日本同为最大出资方,并获得执行机构人事权,逐步主导东亚金融事务。中国还增资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机构,加大对亚非拉地区的金融援助。在多边舞台,中国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运作平台,以金砖机制为次级协调机构,倡导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约束,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同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新华社,2013)。作为部分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上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在对外投资的政策管理上,2013年之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扩大开放政策陆续出台,对外投资简化行政流程和鼓励措施接踵而至。2016年开始,中国开始规范海外投资,在外汇使用和

投资行业上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实施窗口管理(华尔街见闻 2019)。2017 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主要是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遏制,使得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稳健、更趋理性。在对外投资数量和方式上,对外投资从资源寻求型转向资源、技术、市场全面寻求型;投资领域从商贸服务扩展到一般制造、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多重领域,投资形式也出现多元化发展(人民日报 2018)。股权并购成为跨境投资的主流方式。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列世界第二。而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境外经贸区合作建设是新亮点,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集聚平台(商务部 2018)。此外,在投资保护条例上,中国积极通过投资外交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为此,中国加快了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协定谈判。2013 年 7 月,中国和美国首次同意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开展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自 2013 年启动,2016 年 1 月开始推进实质性的文本谈判。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互联互通是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和跨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国从雄心水平、战略规划、国家角色等方面全面提升区域和跨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特别是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前后,中国对于跨区域开放合作进程与亚太经济增长之间的意义关联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中国不仅将跨区域开放合作描述为亚太长期保持强劲增长的动力源,而且更为明确地展望亚太经济能够展现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传统的跨区域开放合作已无法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增长需求,开放型亚太经济将承担起“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任,中国在其中也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同时,中国为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明晰的战略规划,推进落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愿景,更将推进区域内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达成包含在总体战略之中,使之成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共同构建均衡、共赢、包容的国际经贸体系”的核心路径。

经由这一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中国的角色由区域一体化的参与者开始向“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型,并由此向亚太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展现出一个更值得信赖的、维护地区秩序和自由贸易的中坚力量的形象(Heydarian 2016)。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一贯主张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而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意中所指不言而喻,既是一种对跨区域开放合作的立场表态,也可视作某种自我警戒。

三、新中国经济外交的整体特征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变化分期越来越短,第一个阶段接近三十年,第二个阶段超过二十年,而第三个阶段不足十年。与之相反,后续阶段的内容及其变化却越来越丰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外交战略意图、影响因素和基本特征的动态演变是分不开的。

1. 战略意图

经济外交中通常存在三种张力: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国际压力与国内压力之间的张力;政府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张力(Bayne 和 Woolcock 2011)。这些张力也充分反映到对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解读中。关于中国经济外交背后的战略意图,历来存在着不同维度的解释,大致具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经济收益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具有显著的内向型意义,即建立对外经济联系的终极目标在于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也恰恰是出于这个逻辑,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拓展对外经济联系背后的政治含义不无担忧,后者又反过来成为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面临

的挑战之一(Johnson 等 2014)。

第二 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认为,经济动因在中国经济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为有限,中国在选择经济合作伙伴时,更倾向于以其对中国主导的政治秩序的认同度为标准(Zeng 2016)。例如,根据这种解读,中国经由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所倡导的不仅是一种多边经济秩序,更是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政治安全秩序(Cai 2016)。那些认为中美逐渐由经济相互依存向战略竞争转化的判断也源于这个逻辑(Health 2016)。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外交往往是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秩序做出的回应。例如,基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不信任和对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谈判现状的不满,中国寻求构建新的多边机制,以扩展自身在亚太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Ye 2015)。近年来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深化改革的需求愈加凸显了加大经济开放力度并予以之激发国内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与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合作的持续渴望同时作用于多边进程,在此情况下,塑造一个开放型经济秩序维护者的国家形象,对于拓展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意义更为突出。

上述多样化的解读和诠释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战略尚未完全成形的折射,也表明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与方案的推进亟需域内外其他国家的理解与认同。如果不能有效降低这种猜疑、观望乃至恐惧,中国的经济外交在战略互信的构建上将面临重重障碍。

事实上,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外交背后往往蕴含着多种战略考量,“经济”本身兼具工具性和规范性要素。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不同阶段的实践中彼此交织、各有侧重,由此也在不同的案例中对多边、诸边、区域、双边、单边等不同层次的政策行为有所偏好。例如,在中国的实践中,对外援助与对外经济合作的界限较为模糊。因此,有学者把中国的模式称为“发展引导型模式”,即通过“援助+合作”的方式帮助和引导受援国实现自主发展,并最终以实现受援国与援助国共同发展为目的(张海冰 2013)。基于自身在改革开放和扶贫减贫中的正反经验,中国在非洲等地区的对外援助中采取了援助、投资、贸易、技术合作等多种手段合而为一的策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Brautigam 和 Tang, 2012)。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主要基于外交政策考量,其他形式的援助则侧重经济利益考量,两者实现了较为有机的融合和互补(Dreher 等 2018)。又如,中国在非洲等地建立的海外经济特区就包含诸多战略和利益考量:既要确保资源、加速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品出口、减少贸易摩擦,又要加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软实力投射(Brautigam 和 Tang, 2012)。换言之,对于中国经济外交需避免简化论,而从更为多元和动态的视角进行分析。

2. 影响因素

纵观不同时期的中国经济外交,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前两个因素属于客观条件,后两个因素属于主观认知,但两者又彼此联系。

(1) 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变化。一般而言,市场力量越大,在经济外交中的谈判力量和杠杆作用就越明显,开展经济外交的效力也就越高。这种市场力量既包括自身的市场规模、购买能力等正面因素,也涉及实施经济制裁的可信度、有效性等负面手段。

(2) 世界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这一“大势”是开展中国外交的现实背景和基本格局,经济外交亦不例外。

(3) 中国对于国际格局及世界经济的战略立场。这一影响因素与前一点息息相关,当中国顺势而为、两者相向而行时,中国的经济外交就发展顺畅、成绩显著,当两者出现时滞、落差乃至背离时,中国的经济外交就相对举步维艰。

(4) 对于经济与外交关系的整体认知和态度。在前述战略性因素的指导下,这一因素侧重技术性层面,即本文开头所述的“道与术”的问题。贸易、金融、援助等各个领域经济外交的分期和表现略有差异,因其体现了开展经济外交的不同能力和意愿。经济外交的具体行为在政策反应的战略性与应激性上也不尽相同。

由于上述四大影响因素,中国的经济外交也在 70 年内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四个阶段发展变化(见表 1)。这些阶段性的变化符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概念,均是在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金融危机等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背景下,由中国主动做出的调整乃至变革,是前述客观条件与主观认同共同作用的产物。

表 1 四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外交及其影响因素

时期	自身经济 实力变化	全球经济 发展态势	中国的 战略判断	经济与外交 的关系	标志性领 域和案例
“游离期”	缓慢恢复	东西方对立	自力更生	经济从属和服务于外交	对亚非拉国际提供发展援助
“回归期”	快速增长	全球化起步	改革开放	通过外交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开放市场、吸引外资
“融入期”	加速增长	全球化加速	融入利用	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引领期”	高位运行	深度调整	塑造引领	利用经济实力积极有所作为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 整体演变

在上述四个阶段的演进中,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出现了一系列整体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也并非完全呈现线性发展的轨迹,且仍处于动态调试之中。

第一,在行为主体上,中央政府仍是开展经济外交的首要行为体,但地方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起到的作用也日渐突出。这与中国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和深化是分不开的。因此,“海外利益保护”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也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兴领域。

由于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国外交,中国的经济外交也面临诸多变革趋势。如权力的相对分散化和多元化,对于中国应有的国际化程度存在不同意见,对于维护核心国家利益与参与全球秩序规则之间关系的不同诉求等(Jakobson 和 Knox, 2010)。这些变化趋势也在整体外交中有所显现,但相比其他领域的外交,更为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外交中。

第二,在手段方式上,“正面经济手段”仍占据主体,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市场、资金、能源和资源的安全,借助这一特殊的外交机制可以化解经贸摩擦,提升国际经济影响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例如,在争论颇多的中国对外援助中,尽管很难说中国的援助分配与政治因素完全绝缘,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政治问题确实不是后续几个阶段中中国对外援助决策的主要因素,且援助分配与受援国的自然资源和制度特征基本不存在相关性(Dreher 和 Fuchs, 2015)。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运用“负面经济手段”的频率和规模也渐趋上升。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长期成为被制裁的对象,无论是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及其中的“中国委员会”的制裁,还是 1989 年政治风波后遭受的西方制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但近年来,中国政府也不忌于有效运用经济制裁的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在较短时间内反制特定国家。这些实践以单边制裁、非全面制裁和贸易制裁为主,客观而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阎梁, 2012)。

第三,在机制建设上,经济外交机构和职能逐步完善,规章制度不断健全。2018 年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财经委员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治国理政的核心机构。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农业部、科技部、工信部等负责特定产业的部委均是参与经济外交的主要政府部门。此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其

他机构的作用和职能也十分重要。部门利益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例如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自由化力量与保护主义势力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市场开放的进程,“经济外交的有效性受到政府内部经济和政治部门之间协调问题的影响”(Jiang 2010)。为了更为有效地推进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部门间协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各个部门内部也大多经历了相应的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

2004年2月,外交部政策研究司设立了“经济外交与合作”办公室。2004年,商务部设立了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2010年,新设正部级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一职,并由两位副部长担任副代表。2012年外交部成立了国际经济司,2013年12月建立了“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外援助的部门间协调,2008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和机构正式成立了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2011年2月这一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2018年3月,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应运而生,极大地弥补了原有对外援助中部门分割、权责重叠的不足。

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6年更名揭牌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传统智库以及社科院系统、高校智库、部分新兴的社会化智库等也在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咨询、学理研究、政策宣传等方面起到了辅助功能。

机制建设上的对外层面则主要表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中国参与甚至起到领导作用的机制不断涌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已有多边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也显著提升。

第四,在外交风格和政策取向上,中国的经济外交在保持防御性传统的同时日益具有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中国不再仅仅是现有机制和规则的“接受者”,一味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合作、电子商务、供应链、价值链、中小企业”等诸多新兴议题上,中国不仅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模式,而且完全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和国际实际,积极提出并主动谋划反映中国优势的新议题和新规则(袁波等,2017)。这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中不可或缺、不应偏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在处理经济外交的内外关系上,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呈现高度互动的态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两种资源的统筹和互动更为明显。因此,经济外交与“改革开放”“走出去”“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国内经济政策紧密交织。例如,近年来,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拓展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和扩大互为表里。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为中国参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积累经验,为中国的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

反过来,为了缓和或消解别国对于中国经济外交的若干忧虑、质疑乃至批判,也需要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使外部经济交往与内部经济治理实现真正的协同和互励(Drysdale等,2017)。人民币汇率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开放、产业政策优化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四、结 语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决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对新时期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总体要求和根本部属。十九大报告亦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传统上,中国无论是在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国的关系中,还是在处理与包括发展中中小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时,经济交往都被冠以“压舱石”“稳定器”等比喻,突出其正面作用。然而近期由经贸纠纷引发的体制摩擦开始浮出水面,如何更为妥善而有效地开展经济外交充分考验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战略决断和政治智慧。

经济外交包含“欲利”与“好义”之辩。经济外交中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体,也就面临着能力和意愿的互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以及国内认同与国际道义的取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提出高可信度、有效性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本质要求。放眼未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有责任通过切实的方案维护和巩固这一进程,并在真正的意义上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方案”的独特性和有效性离不开对于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如何实现均衡的利益分配?如何实现高标准与灵活度在同一个方案之中的有机统一?

“中国方案”需要“中国担当”。这不仅需要中国积极转换思维,适当地为域内外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小国做出一定让步,也需要捐弃前嫌,以区域和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指归,积极拓展与其他大国在发展方案和实际利益上的汇聚点,共同牵引全球经济治理的崭新实践。

参考文献

- [1] Baldwin, D. A. . Economic Statecraft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Bayne, N. , Woolcock, S. . What is Economic Diplomacy? In: Bayne, N. , Woolcock, S. , eds. , The New Economic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M].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 2011.
- [3] Blanchard, J-M, F. , Mansfield, E. D. , Ripsman, N. M. , eds. . Power and the Purse: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M].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0.
- [4] Brautigam, D. , Tang, X. . Economic Statecraft in China's New Overse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oft Power, Business, or Resource Security?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88(4): 800-816.
- [5] Cai, P. . China's Responses to Mega-Regional FTAs: A Chinese Perspective [J]. Asian Survey, 2016, 56(6): 1123-1144.
- [6] Copper, J. F. . China's Foreign Aid and Investment Diplomac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7] Davies, P. . 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towards Mutual Benefit [R]. Diakonia and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Eurodad), 2007-09.
- [8] Dreher, A. , Fuchs, A. , Parks, B. , Strange, A. M. , Tierney, M. J. .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62(1): 182-194.
- [9] Dreher, A. , Fuchs, A. . Rogue Ai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48(3): 988-1023.
- [10] Drysdale, P. , Triggs, A. , Wang, J. . "China's New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7, 12(2): 258-277.
- [11] Ferdinand, P. , Wang, J. . China and the IMF: From Mimicry towards Pragmatic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89(4): 895-910.
- [12] Heath, T. R. .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Economic Diplomacy [J]. Asia Policy, 2016, 22: 157-191.
- [13] Heydarian, R. J. . Why China Presents Itself as a Vanguard of Free Trade [R].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6-11.
- [14] Jakobson, L. , Knox, D. .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R].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2010-09.
- [15] Jiang, Y. . China's Pursui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Is China Exceptional?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7(2): 238-261.
- [16] Johnson, C. K. , et al. . 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R],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06.
- [17] Li, M. , Natalie, Y. H. , eds. . China's Economic Statecraft Co-optation, Cooperation, and Coercion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6.

- [18] Mitcham, C. J. .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Japan ,1949 ~79: Grain ,Trade and Diplomac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19] Ye , M. . China and Competing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TPP ,RCEP ,and the New Silk Road[J]. Asian Security ,2015 ,11(3) :206-224.
- [20] Zeng , K. .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 Diplomacy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6 ,9(3) : 277-305.
- [21] 陈德铭等. 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2]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 沈晓雷 高秀明译.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3] 傅自应. 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 [24]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J]. 求是 2014(7) .
- [25] 贺平. 中国与 WTO: 从适应到建设[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12) .
- [26] 杰夫·贝里奇 艾伦·詹姆斯著 高飞译. 外交辞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7] 李巍 孙忆.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J]. 外交评论 2014(4) .
- [28] 李巍. 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外交引领者[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 [29] 李巍.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2) .
- [30] 任晶晶 王浩. “双重转型”: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理念创新与战略布局[M]. 竺彩华主编. 中国经济外交年报: 2015.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 [31] 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R]. 2018.
- [32] 商务部研究院.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30 年[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8.
- [33] 斯蒂芬·伍尔考克著 张晓通等译. 欧盟经济外交: 欧盟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34] 阎梁.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 目标与政策议题[J]. 外交评论 2012(6) .
- [35] 易小准. 十年之路——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文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36] 袁波 李光辉 权金亮. 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新趋势与中国的自贸区应对策略[J]. 国际经济合作 2017(7) .
- [37] 张海冰. 发展引导型援助: 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38] 张军. 中国特色经济外交迈入新时代[J]. 外交 2017(1) .
- [39] 张晓通.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J]. 欧洲研究 2014(4) .
- [40] 张晓通. 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构建: 一项初步的尝试[J]. 外交评论 2013(6) .
- [41] 赵可金. 经济外交的兴起: 内涵、机制与趋势[J]. 教学与研究 2011(1) .
- [42] 赵文志. 中国大陆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16.
- [43] 周弘.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 30 年[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1) .
- [44] 周弘. 中国援外 60 年[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45] 中国金融外交的近与远 强调“包容性收益” [N]. 新华社. 2013-05-05.
- [4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历史最好水平[N]. 人民日报. 2018-08-31.
- [47] 中国迎外资并购第二波浪潮 股权并购驱动跨境双向投资[N]. 华尔街见闻. 2019-01-16.

(责任编辑: 朱 颖)

Contents & Abstracts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70 Years: Overall Evolution ,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Contributory Factors

He Ping(3)

Over the past 70 years ,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disassociation period , returning period , integration period and leading period. In its economic diplomacy , both the " economy" and the " diplomacy" have been increasingly realizing a two-way interaction , each reflecting the glowing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nd rationality. Four main contributory factors can be found i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se periods: the change of China's ow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s economic strength in particular ,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China's strategic stance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world economy , and China's overall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economic-diplomatic relations. These factors led to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evolu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over the past 70 years in terms of its core actors , ways and means ,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 diplomatic style ,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Zhou Yu(15)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s for China'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among the four factors: marketization , privatization ,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ort , the export plays a major role in promoting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As far a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is concerned ,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there have been three miracles in the world: the Japan miracle , the East Asia miracle and the China miracle.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iracles is the rapid growth of export , which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Compared with the Japan miracle and the East Asia miracle , the China miracle is characterized by faster and longer export growth. The reason why China can do this is that its large-scale advantage and powerful government advantage strengthen the role of backwardness advantage and low-cost advantage.

Does "Neighborhood" Affect Companies' Expor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Companies in China's Economic Function Zones

Liu Bin Zhao Xiaofei(24)

At present , with de-globalization being a focusing heat point continuously , the uncertainty of exports is increasing , so the export signals of neighboring compan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export decis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foreign trading companies in China's economic function zone from 2000 to 2006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neighboring effect on potential export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 in general , the neighboring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xport entry of potential export companies. The greater the density of neighboring export companies and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xport signal ,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n the export entry of potential export companies. Secondl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after entering ,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ing effect on the export of companies i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After the third year , the impact effect basically disapp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 specificity , the products with stronger characteristics of asset specificity ,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the neighboring effect on the entry of potential export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intermediaries , trade intermediaries have stronger risk identification capabilities , so neighboring companies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the export of trade intermediates. In short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solution